影响训练”。在这届冬奥会比赛中，张虹的膝盖里还有着6管积液，“每当腿快要支不住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不能摔，最后能够站在赛场上完成比赛，我觉得已经战胜了自己”。  
　　张虹脖子上挂着的证件，已经从运动员变为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往随身携带的冰刀等比赛装备，也变成了一袋袋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材料。在这个新的“赛场”上，这位冬奥冠军已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提高，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也更加自信，逐渐跳出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提出有别于西方的创新理论，一系列体现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观点正孕育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初见成效。  
　　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者就意识到，构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重要，并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但当时的理论构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积累不足，中国自身对外交往的经验也不充分。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过长期积累和历史演变，已经在学科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将兴趣主要放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理论上，而对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动力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身份、角色、地位发生变化，需要从大国视野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利益界定、战略规划，并在学术上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据此提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时代课题。  
　　为了构建起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冷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仍然以西方文明为中心来研究国际问题，依据西方经验衡量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国际化进程。一些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视而不见，仍然抱着你输我赢的霸权思维模式，在理论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设置障碍。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和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反差，开始审视西方理论的学术基础和实践效果，质疑其科学性和适用范围。这样的质疑和反思促使中国学者总结中国经验、探索中国理论，促成了学科新成果的取得。  
　　如今，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构建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一是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中国学者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能够认识到西方理论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理论，确保中国学派的创新性。二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正确义利观及国家总体安全观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创造性地展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外交实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鲜中国经验。三是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的学术自信不断增强。学者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借鉴智慧，顺应国际社会对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期待，立足中国外交实践，力图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来研究阐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突破，逐渐开创研究新局面。  
　　学术贡献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外交实践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学者通过对一系列理念、方针的阐释，从学理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进行探讨，在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问题上得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意义，展现出中国学派的学术价值，更为国际关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出国家关系理论新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更为频繁，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世界也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作为。而一些西方学者仍然以结盟对抗和干涉思维思考国际关系，认为大国之间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它们以实力为基础并以利益为目标进行竞争，这种观念妨碍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对此，中国学者指出，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将各国视作截然对立的矛盾体，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认为彼此可以相互依赖、共存共生。中国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主张顺应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迫切愿望，为破解当下安全与发展难题、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正确思路，也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  
　　提供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然要让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现状无条件接受，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及建构主义这三大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对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不出有效解决方案。中国学派在经验事实和理论层面对国际关系现状进行了反思，特别是主张消除西方一元价值观、二元对立思维对国际关系实践的负面影响。中国提出改革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主张各方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各国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立足中国外交实践，中国学者总结国家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治理观，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理论支撑，为增强我国议程设置权、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贡献智慧。  
　　提出中国风格的外交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外交实践的深入广泛开展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新理念新举措新战略，指导中国外交呈现鲜明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中国学派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依据中国理论视角，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作出理论总结。中国学派阐明中国外交所遵循的思维逻辑，明确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积极参与、贡献和改革的良好愿望，把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阐明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遵循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系统解释各领域各方向对外政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不仅有助于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促进中国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也将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发展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取得显著成果，但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还存在一定欠缺。今后，中国学派还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提升理论品质。应致力于形成兼具科学性与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学派总结了中国对外交往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针对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今后需要将这些相互关联但又彼此不同的议题整合起来，在相关领域实现核心概念共享与核心问题共通，从而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融合起来，形成系统解读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体系。同时，还需要理顺这些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特别是解决彼此在本体论立场、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上的一致性问题，提高中国学派的理论逻辑自洽性。此外，还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并赋予其现代内涵，突破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在时空与文化上的界限，形成既能科学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扎根外交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现实解释力。中国外交是中国学派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中国学派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外交的关联性，与外交实践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国家的外交需求推动外交理论创新，而外交理论成果又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拓展外交空间提供支持。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与中国学派的内在联系越发紧密。“一带一路”倡议超越西方国际体系的局限，将中国学派对优化国际治理体系的构思具体化；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国际关系中大国争霸逻辑，印证了中国学派提出的大国之间协调相互关系、维持互动过程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直接为中国学派提供了新的核心概念。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外交与中国学派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进一步加强。  
　　推动交流合作。要努力提升中国学派的国际影响力。建设中国学派，不仅要明确中西方理论的差异，更要理解这种差异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增进彼此理解，促进中西方理论的交流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增强中国学派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从而引领全球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国学者不仅要学会在中西方理论岛之间穿行，更要搭建起中西方理论沟通的桥梁，促进中西方理论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全球学是一门以世界为视角的综合性学科，它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问题研究。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演变，全球学有了新的研究内涵。它以经济全球化为时代和学科背景，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所催生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全球治理为目标，以挖掘、揭示全球性规律为学术宗旨，探究世界的整体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增进的需要。全球学正是基于上述两种需要而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如今，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正在改变着人们原有的制度、观念、价值、生活方式，跨国性问题、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人们不能再局限于国家视域和领土边界来思考解决之道，而需要以宏观视角从整体上予以回应和处理。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凸显了世界的复杂性、问题的严峻性，学术研究也应突破原有的专业局限，对这些问题给出理论答案和政策回应。全球学正是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探究跨国性、全球性现象与影响。因而，全球学的构建符合时代需要，能够扩大和提升人类的认识领域和认知能力，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全球学具有较为明显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但它不是已有学科的大杂烩，而有其相对独立的学科内涵与范畴。全球学的学科范畴包括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性等。其中，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全球性为其核心范畴。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学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背景。全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两者密不可分，关注、研究和解决全球问题是全球学的显著特征和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将全球学视为全球问题学。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客观的事实与现象，它们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需要人们理性地认识与解决。于是，全球治理也成为全球学的中心环节。全球性则是一个更具本质意义的概念与范畴，以它来标识全球学，更能体现全球学的学科特色。如此，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全球性这四个范畴编织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理解全球学还要注意把握它的问题导向和治理导向。全球学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研究对象，以解决全球治理中的问题为研究宗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学是全球问题学和全球治理学的综合。当强调问题导向时，全球学可以理解为全球问题学；当关注治理导向时，全球学又可以理解为全球治理学。而无论是全球问题学还是全球治理学，都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现象、关系、价值、制度的思考与回应，都要探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  
　　要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全球学还须厘清自身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比较中明确自身独特的学科范畴、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并恰当地借鉴相关学科的成果。其中，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联系最为密切。两者都坚持以全球视野进行研究，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社会生活的全球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具有内在的学术与学科渊源。在学科设置和研究方面，既可以将全球学暂时置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之下，也可以把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分支全球政治学纳入全球学。这种无法割断的学术与学科联系，表明构建全球学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的支撑。但又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不能混同与替代。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向度是研究世界上多种行为体在国际层面上发生的政治关系，而全球学则聚焦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全球制度，突出全球主题，并不局限于政治关系。  
　　对中国而言，全球学还较为陌生，在中国构建、发展这门学问大有可为。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能力，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全球学能够在这些方面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智力支持，并培养造就全球治理人才，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做好知识和人才储备。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以什么样的策略来处理国家间关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正确义利观，其理念源远流长，其思想根基深厚，其实践一以贯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是一项重要内容。它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同时，主张义利两有、义者利之和，重视道义也不否定利益，提出义以生利、义以建利等。并且认为，凡是符合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害天下、损人自利的行为则是不义，义与利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达成统一。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体现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正确义利观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于中国发展与世界转型互动的进程，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诉求和鲜明特色，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新思路的重要表达，也展现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  
　　中国倡导的正确义利观，将“义”置于重要位置，以道义和公平正义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强调求利的过程必须符合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正确义利观不承认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压贫，强调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国际关系“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念的超越。  
　　中国始终自视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对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感同身受，并且一直将自身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结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逐渐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正确义利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担当和积极作为。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创新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价值导向和关键举措。习近平同志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拉，中国积极探索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新思路，通过全面深入的经济合作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让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经验。  
　　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中国致力于将自身发展规划与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安全与繁荣。同时，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中国积极推进以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等为主要目标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竭尽所能帮助西非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迅速救援遭受强震的尼泊尔……这些都是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的生动体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前行，汇聚成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磅礴力量。  
　　正确义利观指向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主张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良性互动，既为中国自身发展营造良好外部条件，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近日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研讨会。与会者围绕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吸引人才强磁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发挥好人才优势，把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好。在实践中，还存在引才目标不明、单项政策虚空、管理技术滞后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制度化管理，建立开放统一的人才管理体系，构建全景式综合人才政策。当前，尤其要把能够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发现好、培养好、使用好，培育一大批既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又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有深入细致把握的人才，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近段时间，有关比特币的新闻非常吸睛，区块链也跟着火了一把。资本市场上，各种区块链概念股的股价涨跌犹如过山车般惊心动魄。从反应敏锐的资本市场可以看出，区块链正站上风口，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什么是区块链？  
　　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没有中心，数据存储的每个节点都会同步复制整个账本，信息透明难以篡改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重视并参与区块链技术研发。从最初的比特币、以太坊，到各种类型的区块链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基金、金融机构，贴上“区块链”标签，立马就“金光闪闪”。不仅如此，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也被各种解读区块链的文章刷屏。  
　　那么，到底什么是区块链？  
　　工信部指导发布的《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这样解释：广义来讲，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进行了通俗解释：“简单地说，区块链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去中心化，即与传统中心化的方式不同，这里是没有中心，或者说人人都是中心；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意味着记载方式不只是将账本数据存储在每个节点，而且每个节点会同步共享复制整个账本的数据。同时，区块链还具有去中介化、信息透明等特点。  
　　“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技术，具体讲就是一种账本技术。账本记录一个或多个账户资产变动、交易情况，其实是一种结构最为简单的数据库，我们平常在小本本上记的流水账、银行发过来的对账单，都是典型的账本。”腾讯金融科技智库首席研究员王钧说，安全是区块链技术的一大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分布式的存储架构，节点越多，数据存储的安全性越高；二是其防篡改和去中心化的巧妙设计，任何人都很难不按规则修改数据。  
　　以网购交易为例，传统模式是买家购买商品，然后将钱打到第三方支付机构这个中介平台，等卖方发货、买方确认收货后，再由买方通知支付机构将钱打到卖方账户。由区块链技术支撑的交易模式则不同，买家和卖家可直接交易，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平台。买卖双方交易后，系统通过广播的形式发布交易信息，所有收到信息的主机在确认信息无误后记录下这笔交易，相当于所有的主机都为这次交易做了数据备份。即使今后某台机器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数据的记录，因为还有无数台机器作为备份。  
　　提到区块链，很多人就把它与比特币联系在一起，不少人甚至把区块链等同为比特币。何飞说，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种呈现方式，但区块链并不等同于比特币。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和基础架构，而比特币是区块链的成功应用，但并不意味着区块链只能应用到比特币上。  
　　区块链有什么用？  
　　能解决金融、公益、监管、打假等很多领域的痛点难点，但有不少适用条件  
　　金融服务是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应用领域。运用区块链技术能解决支付、资产管理、证券等多个领域存在的痛点。  
　　以支付领域为例，金融机构特别是跨境金融机构间的对账、清算、结算的成本较高，涉及很多手工流程，不仅导致用户端和金融机构后台业务端等产生高昂的费用，也使得小额支付业务难以开展。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间的对账成本及争议解决的成本，显著提高支付业务的处理效率。另外，区块链技术为支付领域带来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使金融机构能更好处理以往因成本过高而被视为不现实的小额跨境支付，有助于实现普惠金融。  
　　比如，为解决金融机构间对账成本高的问题，2016年8月，微众银行联合上海华瑞银行推出微粒贷机构间对账平台，这也是国内首个在生产环境中运行的银行业联盟链应用场景。微众银行区块链首席架构师张开翔认为，传统“批量文件对账”模式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成本高问题，正是区块链技术的用武之地。随后，洛阳银行、长沙银行也相继接入机构间对账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优化微粒贷业务中的机构间对账流程，实现了准实时对账、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等目标。截至目前，平台稳定运行1年多，保持零故障，记录的真实交易笔数已达千万量级。  
　　在公益领域，区块链技术也大有可为。蚂蚁金服涉及区块链的首个应用场景就是公益，帮助一群听障儿童获得一笔善款，然后运用区块链技术促进公益更加开放透明。蚂蚁金服技术实验室高级产品专家胡丹青说：“区块链公益平台就像是我们在互联网上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邮寄资金的邮局。用户捐的每一笔钱，我们都会打包成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通过区块链平台传递，每经过一个节点，我们都会盖上一个邮戳，最后送到受捐人手上。这样可以保证用户捐的每一笔钱都是透明、可追溯、难以篡改的。”  
　　在商品打假方面，区块链技术可以大显身手。胡丹青介绍，蚂蚁金服将区块链技术用在了正品溯源上。目前，已有部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海淘商品比如奶粉，用支付宝扫一扫，就能知道是不是正品。“跟此前商家自录入商品信息不同的是，区块链是让多位‘记账师’公正、独立、不可抵赖地完成记账。”  
　　对于金融监管，区块链技术也能发挥一技之长。2017年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深圳）发布的《金融区块链底层平台FISCO BCOS白皮书》认为，区块链为金融监管机构提供了一致且易于审计的数据，通过对机构间区块链的数据分析，能够比传统审计流程更快更精确地监管金融业务。例如，在反洗钱场景中，每个账号的余额和交易记录都是可追踪的，任意一笔交易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脱离监管视线，这将极大提高反洗钱的力度。  
　　有业内人士认为，区块链1.0主要针对数字货币；区块链2.0针对智能合约，可以应用在金融市场中；区块链3.0适用的场景将会更多，甚至会开创一个“区块链时代”。  
　　何飞认为，区块链确实能解决很多领域的痛点难点，但区块链不是万能的，也有很多适用条件。  
　　比如，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特点适合多方参与的场景，如果只是单边或双边参与价值就不大。由于需要每个节点都去核对，区块链技术也不适用那些高频交易的活动。  
　　再如，区块链强调的是公开透明，并不适合对数据隐私要求特别高的场景。  
　　区块链会成新风口吗？  
　　技术目前还不太成熟，要警惕概